

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林长生 著

我们可以选择宽容，
但是我们拒绝遗忘

南京大屠杀 之铁证



中央
CENTRAL CHINA

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之铁证 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林长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R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 林
长生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6
ISBN 7-80211-127-7

I.南... II.林...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731 号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

作 者:林长生

责任编辑:韩德江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 (100035)

电 话:66560272 (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 (发行部)

h t t p : //www.cctpbook.com

E - mail : 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廊坊京华万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030×670 毫米 1 / 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7.875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序 言

自古以来,战争的魔影一直困扰着人类,“化干戈为玉帛”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铸剑为犁”是全世界人民前赴后继的追求目标,但是这一境界和目标的实现又谈何容易。两国间的战争状态可以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来结束,两国民众的心理战争状态尤其是受害国民众的战争心理却会刻骨铭心而难以消除。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的实质是中日两国对日本对华战争的历史认识截然相反:中国认为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政府理应对侵华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正式道歉,并承担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责任;日本则拒绝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拒绝了对侵华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和正式道歉,并拒绝承担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责任。分歧的焦点是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完全相左。这一分歧由来已久,近期的突出事例就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参拜供奉着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偏偏要将其作为民族英雄来参拜,并且要经常化和制度化。

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已经是近60年前的事了,结束两国战争状态的《中日联合声明》也已经签订30多年了,可是中国受害民众迄今不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而且还不时受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再次伤害,其失望和愤怒的心情,不亲身考察和感受,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如何解开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而产生的分歧的“死结”,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曾经亲身遭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幸存者。如今,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67周年之际,林长生先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将他的那段九死一生的经历,以《南京大

屠杀之铁证》为名,公之于世,并且对日本右翼势力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作出评论。

我认为,此时出版这部《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昭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

67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成千上万罪行中的最严重者。侵华日军从上海到南京一路上大肆杀烧淫掠,成为攻占南京后大规模杀烧淫掠的预演。日军攻占南京城之前对南京实施了近4个月的“无差别级轰炸”,成为血腥屠城的开端。侵华日军围攻南京中国守军,企图“以较短时间摧毁敌军主力”^①。当这一战役目标未能达到时,侵华日军于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就大肆屠杀中国军俘虏,并且以处置“败残兵”为名屠杀中国青壮年人;同时大肆强奸、抢劫和纵火焚烧,恐怖威慑手段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目的就是妄图以极其残暴的恐怖屠杀政策,慑服中国军民,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正如目睹这一惨绝人寰暴行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斯蒂尔的判断:“日军似乎想把恐怖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以便使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抵抗日军,就会有这样可怕的结果。”^②

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近年来已经被“加害方自供”、“中立方证言”和“受害方控诉”等第一手资料所证明。“加害方自供”包括日本军方《战斗详报》、日本官方的机密电报、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日本随军记者的见证报道、日本随军记者和日军官兵自行拍摄的暴行照片、满铁密档、日本战犯的供词等;“中立方证言”包括南京安全区档案、外籍人士的见证、外国记者的报道、外国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420页。

②[美]《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

记者和国际人士拍摄的照片和电影胶片、美德等国的档案等；“受害方控诉”包括幸存者的控诉、目击者的见证、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等。其中“受害方控诉”，尤其是幸存者的控诉和目击者的见证，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

例如，仍然健在的南京市民李秀英就是死里逃生的人之一，当时在南京的美籍牧师马吉拍摄的电影资料中有南京市民李秀英反抗日军强暴被刺伤后躺在鼓楼医院里的镜头，说明文字写道：“这个 19 岁的女子在难民区的美国学校里避难。她怀第一胎已经 6 个半月。一个日本兵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他用刺刀狠狠刺了一通。她的胸部和脸部被刺伤 19 处，腿上挨了 8 刀，下身挨的一刀有 2 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进鼓楼医院一天后就流产了。”^① 马吉拍摄的电影资料保存在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

又如，仍然健在的南京市民夏淑琴经历了家中 7 口人惨遭杀害的劫难，美籍牧师马吉拍摄的电影资料也记载了夏淑琴家的遭遇。“12 月 13 日，约有 30 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新路口 5 号房子前并想入内。姓哈的房主人是伊斯兰教徒，他刚刚打开门，就立即被左轮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居民，但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 1 岁的婴儿逃到客厅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她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她的衣服被剥光，几个士兵轮奸了她，然后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 76 岁的父亲和 74 岁的母亲及 16 岁和 14 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祖母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左轮手枪打死了。祖父去

^①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6 页。

扶祖母,也遭杀害。他们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二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匕首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到用东西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也躲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最后还杀死了房子里哈先生的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① 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同马吉一起去了现场,他对当时的情景作证说:“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奸,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② 那个被刺刀刺伤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就是夏淑琴。

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等日本右翼分子对李秀英、夏淑琴这样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既怕又恨。他们在无法否认李秀英、夏淑琴的亲身经历的情况下,竟然诬陷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证人”。李秀英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等公开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和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都判定李秀英胜诉。日前,夏淑琴将松村俊夫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告上南京市玄武区法院,等待松村俊夫的必将是正义的审判。

如今,林长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在书中向世人昭示了他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

“沿途我们看到好几条街上大火冲天。条条街巷里都躺有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不少人家看门守家的人已被杀害,不时还看到女童和妇女被奸后杀害的惨状。评事街上一具女尸怀里抱着婴尸,鲜血从皮革店门口的石阶上流到石阶下;另有两具男尸

①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页。

②《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29号,引自[日]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 南京事件1》,第29页。

横躺在石阶上,鲜血从鹅卵石缝中流到街心里,令人胆战心惊。”

“我们五人丝毫不敢放慢脚步,一口气越过小拱桥冲上了太平路,抬头一看便被惊呆了——近处躺着一具具尸体,北面的太平路北端,南面的四象桥,东面隔着太平路的马府街都有大火,浓烟滚滚,而且火势还在蔓延,在扩展,走过去不被鬼子打死也要被火烧死。而且南面白下路十字路口处的鬼子在放枪,射杀零零星星的逃命者。正在我们犹豫观望时,南面的鬼子发现了我们,紧随机枪声响,那个从句容逃出来的中年男子倒了下去,喊着‘快跑’的另一个人也中弹而死。”

书中还记述了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和 83 军掉队官兵约 500 多人缴枪投降后,被日军集体屠杀的情景。这次屠杀的两名幸存的中国军人在逃亡过程中同林长生相遇,一起泅渡到江北,得以脱离虎口。林长生的亲身经历,尤其记述的这次集体屠杀,可谓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

正是李秀英、夏淑琴和林长生这些幸存者和见证人的亲历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昭示了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仅铭刻在幸存者和见证人的心里,也深深地留在炎黄子孙的记忆中。日前自杀的美籍华人张纯如之所以调查和揭示日军在南京强奸、虐待、杀害大批中国平民的详情,主要是受其父母的影响。她的父母虽然早就定居美国,但是经常向幼小的张纯如讲述日军在南京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他们因为愤怒而声音都颤抖起来的样子,是激励张纯如探究和揭示这段历史的原动力,而“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使她感到“困惑和气愤”,促使她产生一种使命感,要让包括美国民众在内的西方世界都了解这次战争暴行,于是撰写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希望该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该书问世后,只是唤起了美国民众的良知,他们因此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并且谴责日本拒绝反省和认罪的顽固态度;而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处心积虑地为南京大屠杀翻案。

二、驳斥日本右翼势力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谬论

促使林长生将这段亲身经历公之于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日本右翼势力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义愤。他在书中写道:“就我这个幸存者的心愿来说,也不大愿意纠缠以往,经常回忆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毕竟有碍身体健康,让人过得不舒服。生活应随时代前进而有新的内容,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以使自己的明天比今天过得更快活,更充实,更有生气。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日本,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并把它当作‘无稽之谈’的,有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已出版专著,在日本社会上引起反响,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集右翼势力诽谤之大成,对南京大屠杀的定论进行了恶毒攻击。像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挑起战火一样,既然田中以《虚构》污蔑历史事实,挑起争端,我只好应战到底。”

尽管日本在 1944 年 9 月 2 日的投降书中承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波茨坦宣言》第六条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规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 25 名甲级战犯处刑,并且将包括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在内的 7 名首犯处以极刑。日本在 1951 年 9 月 8 日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承诺:“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可是,战后 50 多年里,右翼势力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他们选择了把否定南京大屠杀做为全面翻案的突破口。

1948 年 12 月 23 日,松井石根等 7 名甲级战犯被吊在绞刑架上,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随即将这 7 名甲级战犯的尸体在久保山火葬场火化,骨灰撒掉。可是松井石根辩护律师之一的三文字正平、久保山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和火葬场附近的兴善寺主持市川伊雄事先密谋策划,于第二天深夜,在火葬

场一个角落的深坑里掏出松井石根等人的骨灰,几经转移,藏在热海伊豆山山腰“兴亚观音”附近。所谓“兴亚观音”,是松井石根从侵华战场退役后,用上海战场上浸着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鲜血的泥土塑造的。松井石根曾每天烧香祷告,想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1959年盟军对日本的管制解除后,由曾经得到松井石根提拔、在日本侵华时期充当重要角色的高木陆郎发起,在“兴亚观音”附近建立所谓“七士之碑”。“七士之碑”这几个字是前首相吉田茂写的,碑的背面刻着松井石根等7名被处决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的签名,碑的下面埋着松井石根等7人的骨灰。在其左边依次是所谓“祭祀”1068名日本乙、丙级战犯的碑,所谓“大东亚战争战歿将士之墓”。1960年春天,举行所谓“七士之碑揭幕式”,前首相吉田茂、刚从巢鸭监狱放出来的甲级战争嫌疑犯荒木贞夫等人也都来“参拜”。

三文字正平等人觉得立了“七士之碑”还没有充分显示为松井石根“鸣冤叫屈”之本意,又纠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松井石根辩护的律师清濑一郎、林逸郎等人,于1960年在松井石根的家乡爱知县幡豆町建起了所谓“殉国七士墓”,分出一部分骨灰放在里面。墓碑的正面“殉国七士墓”这几个字是荒木贞夫写的,墓志铭是清濑一郎写的,指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违法性”,颂扬松井石根等七人“殉国”的意义。随后,以这个墓为中心,陆续建起了所谓“陆海军部队战歿者碑”,成了所谓“大东亚战争战歿者的圣地”。一些人不时地在这里搞一些活动,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招魂”。这些人在千方百计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鸣冤招魂”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刮起了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妖风。日本右翼势力甚至扬言要在当年关押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的巢鸭监狱遗址建立旨在翻案的纪念馆。

更有甚者,2003年7月7日,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66周年的日子,日本法庭特意选在这一天开庭审理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百人斩比赛”罪犯向井敏明的女儿向井千惠子以及另一个“百人斩比赛”罪犯野田毅的亲属,诬告客观记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学家藤原彰和记者本多胜一,为向井敏明和野

田毅翻案的诉讼,企图在日本封杀南京大屠杀真相。

然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决不是日本右翼势力所能篡改和抹杀的。日本进步人士不断挖掘和披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罪证。例如,日本某化学公司工人小野贤二在家乡福岛县对乡土部队第六十五联队进行调查,历经8年编成《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一书,收录第六十五联队19名官兵的《阵中日记》,揭露了日军一次屠杀2万名中国军俘虏的事件。例如,第六十五联队第一中队上等兵伊藤喜八的《阵中日记》:“12月17日:今夜在扬子江边枪杀了敌俘虏约2万人。12月18日:午后去枪杀现场参观,真是残酷的惨状。”^①第六十五联队第四中队上尉宫本省吾的《阵中日记》:“12月17日:今天一部分人去参加南京入城式,大部分担任处置俘虏兵。傍晚好不容易赶回来,马上又出发,加入处置俘虏兵的行列。处置了2万多人,终于碰上大出丑,友军也死伤不少。我中队死一人,伤2人。12月18日:午后去收拾敌尸体,天黑也未干完。第二天还得干,就撤回来了。12月19日:早上很早就去继续干昨天收拾尸体的事,一直到午后4点。”^②第六十五联队第七中队上等兵柳沼和也的《阵中日记》:“12月17日,今夜第二小队去杀俘虏,兵士站成半圆形,用重机枪和轻机枪射击。”^③第六十五联队第七中队上等兵大寺隆的《阵中日记》:“12月18日:据说到昨晚杀了俘虏约2万,在长江边两处堆积如山。到7时收拾的部队还没回来。12月19日:午前7时半整队,去从事清扫工作。到长江岸现场,数百具尸体堆积成山,令人震惊。浇上汽油焚烧,极其恶臭。今天师团全部都干这个任务,一直到下午两点才作业完。”^④

①[日]小野贤二等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日本大月书店1996年版,第105页。

②[日]小野贤二等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日本大月书店1996年版,第133-134页。

③[日]小野贤二等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日本大月书店1996年版,第166-167页。

④[日]小野贤二等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日本大月书店1996年版,第194-195页。

日军第六十五联队隶属于第十三师团一〇三旅团,旅团长是山田栴二。他在战地笔记中记载了这次大规模屠杀俘虏的经过:“14日,凌晨4时半出发,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理。15日,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16日,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17日,举行入城式,下午五时返回。18日,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19日,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20日 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尸体累累。”^①

这些史料足以证明,侵华日军战地指挥官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了南京大屠杀。而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天皇裕仁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的责任。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在其关于裕仁天皇的传记性著作《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中译本)一书中,论定了裕仁不但不是傀儡,而且还是大权在握的实力人物,理应对那场侵略战争负有责任,尤其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军暴行负有直接责任。

在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之前,天皇裕仁在宫中设置大本营,任命皇族闲院宫和伏见宫分别担任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直接对侵华日军发号施令。他批准了“轰炸南京及其战略要地”的命令,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开二战时期轰炸人口密集城市之先例,并且揭开南京大屠杀的序幕。12月1日,天皇裕仁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随后将其叔叔朝香宫鸠彦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于12月5日抵达前线司令部,南京大屠杀随即在南京城外展开,并且于攻占南京城后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逗留在苏州,朝香宫鸠彦是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最高指挥官,对南京城内的烧杀淫掠负有直接责任。天皇裕仁不顾国际舆论的抗议,竟然对松井石根和朝香宫鸠彦颁赐诏书和

^①[日]铃木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191—195页。

勋章予以褒奖。

林长生经历了日军对南京的“无差别轰炸”，他在书中写道：“9月25日那天轰炸得最为残酷。自上午9时半至下午4时半，日机先后5次共95架次侵入南京上空，共投炸弹500余枚，炸死炸伤平民600余人。当时下关难民收容所亦不幸中弹，被炸死者在百人以上。前往观看者只见残骸满地，碎尸血衣惨不忍睹；芦棚大火熊熊，浓烟直冲九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广播电台都中弹，被迫停水、停电、停播，给居民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中央医院亦遭到日机的攻击，住院病人和医护人员亦有少量的伤亡。法国大使馆附近亦有两颗500磅重的炸弹落下，幸未曾爆炸，否则办公楼将被炸倒，亦会造成人员伤亡。法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但日本竟然置之不理，继续派出飞机轰炸南京。”

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些翻案行径，尽管中日两国学者已多有批驳，但是林长生以亲历者的身份，驳斥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田中正明等人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种种谬论，更有无可辩驳的力量。

三、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并反省侵华战争罪行

林长生在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谬论之后，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并反省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侵华战争罪行，在书中郑重声明：“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对当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重申：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想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我们针锋相对，坚决地拒绝，且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准备就南京大屠杀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直到他们认罪道歉。”从而切中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要害。

日本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逆流，表面是日本右翼势力在兴风作浪，实质则是日本政府战争责任政策在作祟。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团体结成右翼保守势力，推动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向右调整，致

使日本社会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突破“和平宪法”、拒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等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事件。这一事态在如何对待侵华历史方面形成“三不政策”。

首先是“不认罪”。日本历届政府和国会连其性质是侵略战争都不承认。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首相,没有一届国会,正式承认当年的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

其次是“不道歉”。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公报形式,向韩国、朝鲜正式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脑会谈时,向荷兰、英国正式道歉,却偏偏不向中国正式道歉。

第三是“不赔偿”。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中国的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要求,对日本法院判决的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和强掳中国劳工的赔偿也百般抵赖,将对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赔偿说成“补偿金”,鹿岛公司更直截了当地声明其支付给死难中国劳工的“基金的捐出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

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承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没有承认“战争”是侵略战争,只不过大体承认日本对过去战争的责任并表示最小限度的“反省”。1993年细川护熙出任联合执政党内阁首相,会见记者时表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而遭围攻和非难,随后在就职施政演说中改为“侵略行为”,而且他所说的战争,也没有明确是指日中战争还是亚洲、太平洋战争。其内阁外相羽田孜则流露出“说成‘侵略战争’,想也没想过”的意思。

作为侵略战争罪魁祸首的日本理应主动认罪和反省,以取得受害民众的宽宥。尽管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表达了对于战争的反省和道歉,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有反省的表示,但是不清楚反省的究竟是不是侵华战争,态度暧昧,而且只在这种场合作出表态,故意给人一种非正式的印象,更何况言犹在耳,小泉却又接二连三地跑到供奉着侵华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去顶礼膜拜,怎么让中国人民相信其反省和道歉的诚意呢?

靖国神社如今不仅供奉着被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极刑的 14 个甲级战犯和 2000 多个乙、丙级战犯,还大肆宣扬军国主义理念,公然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翻案。

靖国神社里有一个 1882 年创办的军事博物馆,名为“游就馆”,随后陆续加以扩建。“游就馆”在战前和战时主要陈列从各国掠夺来的战利品,炫耀皇军的“赫赫战功”,战后展出的多为战死者的遗物。2002 年,“游就馆”以庆祝建馆 120 周年为名大加扩建。重新开张的“游就馆”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宣称其宗旨是:“自开馆以来,游就馆就保持着一贯不变的姿态,即一方面彰显和抚慰殉国的英灵,一方面表明近代史的真实。为了成为近代国家,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更为了实现全世界没有种族歧视的自由和平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战争。他们是奉命而战的英灵,彰显他们的武勋和遗德,展示英灵走过的近代史的真实;是‘游就馆’的使命。”包括甲级战犯和乙、丙级战犯在内的日本政治家和军官的遗像作为“靖国之神”赫然挂在“游就馆”里。

“游就馆”的展览蓄意以否认南京大屠杀作为突破口,进而为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翻案。该馆陈列着《东京朝日新闻》当年编造的假新闻《和平复苏的南京》,文字说明称:“1937 年 12 月日军包围南京后,松井司令官曾向下属部队散发地图,标明了外国权益和难民区的地理位置,要求‘严正军规,杜绝不法行为’。败退的中国士兵拥到下关被歼灭。市内对换穿便服的残兵进行了检举,但南京城内一般市民生活恢复了和平。”当年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拉贝目睹了日军的虚假宣传报道,他在日记中收录了这样的假新闻《日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了日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在南京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对此,拉贝评论道:“它再一次表明,报纸

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① 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带来了漂亮的彩色宣传画,一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手中端着饭盒,肩上坐着一个中国小孩,贫困而诚实的农民父母以充满感激和幸福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心地善良的叔叔。遗憾的是,这类彩色宣传画与事实不符,只能把它看成是招揽旅游生意的广告。”^② 美籍金陵大学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在致朋友函中对此评论道:“我们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③

展览中大量篇幅介绍了侵华战争,内容多是军国主义的叫嚣和侵略思想的表露。如将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称为“支那事变”,其解说词称:“1933年塘沽协定之后日中关系出现好转,但1935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八一宣言》以来,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两国关系恶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运动更加激化。卢沟桥的‘小事件’是中国正规军对日军的不法攻击,之后由于日军的反击,发展成北支那事件,使战场扩大到整个北支那地区。此事件的背景是中方拒绝日中和平。之后战争发展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等坚持了8年抗战,最终成为战胜国的一员。”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责任完全颠倒黑白地推到我国方面。整个展览充斥着当年的军国主义用语,“支那事变”、“支那服”、“大东亚战争”等字句到处可见。游就馆还播放名为《我们不能忘记》的所谓纪实电影,其宗旨是:“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日

① [德]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等1997年版,第475-476页。

② 《德国驻华大使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件》,载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1页。

③ [美]史迈士:《致朋友函》,载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俄战争到大东亚战争,再现我国近代战争的历史,接近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的真实性。”充分暴露了为日本全部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意图。

2001年,新当选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各界舆论的反对,在8月13日参拜了靖国神社;为了平息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小泉不得不在10月访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表示“我对因那场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可是,“9·11”事件后,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发生剧变,美国强调其盟国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这正好符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2002年4月,小泉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一发不可收拾,2003年1月14日和今年1月1日连续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决不是简单的孤立事件。首先,自民党在上个世纪80代的选举中就公开提出要实现靖国神社的“国家护持”和“正式参拜”。自民党和其他保守派政治家如此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意在拉选票。据统计,以日本遗族会为中心,由旧日军、自卫队、右翼宗教团体、神社本厅等组成的“回报英灵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等都是自民党的坚实基础,选举和署名运动时,可以随时随地动员几百万人,最多一次署名曾收集到800多万人的签名。

其次是为了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开创新的国民道德。早在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时就声称:“国民感谢为国牺牲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若不这样的话,谁还会为国捐躯呢。”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后不厌其烦地强调:“对英灵感谢、敬畏和崇拜,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日本政府近几年通过各种方法向青少年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推广“心灵笔记本”,强行要求唱国歌和参加升国旗仪式,对拒不执行的教师大加鞭挞,而靖国神社中展示的一切又成了爱国主义绝妙的材料。

第三是提高日本人的士气。“9·11”事件导致国际和日本国内形势的剧变,是小泉内阁对战争责任政策再向“右”调整的背景。“9·11”事件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以所谓民主、自由为标准,实施更加强横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导致20